

Research on Tongji Urban Planning Pedagogy

DEPARTMENT OF
URBAN PLANNING, CAUP
TONGJI UNIVERSITY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 | 著
城 市 规 划 系

同济规划 教育论丛

2007—2017

中国工业出版社



同济规划教育论丛

2007—2017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城市规划系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同济规划教育论丛 2007—2017/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城市规划系著. —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8. 10

ISBN 978-7-112-22603-0

I. ①同… II. ①同… III. ①城市规划-教学研究-高等学校-文集 IV. ①TU98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00015 号

责任编辑: 滕云飞

责任校对: 张 颖

同济规划教育论丛 2007—2017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城市规划系 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三里河路9号)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制版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 26³/₄ 字数: 422千字

2018年12月第一版 2018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78.00元

ISBN 978-7-112-22603-0

(3270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三个特点和两个转变

李振宇

同济大学城乡规划教育已经有 60 多年的历史，规模宏大、配置齐全，成为规划教育的国际中心之一，在国内肩负引领发展的重大责任，在国际上也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2017 年，同济大学城乡规划学成为国家建设的一流学科，并在第四轮全国学科评估中获得“A+”的结果；2018 年，在相关度较高的 QS 国际排名中，同济大学“建筑与建成环境”列全球第 18 位。同济规划教育的发展已经形成了鲜明的三个特点。

第一，把握学术前沿。

人才培养始终和高水平的研究相结合，对学术前沿问题回答成为培养学生的新动力。1950 年代对“城市规划”专业的设立，就是站在学术前沿发展专业教育的结果；其后，在 1980 年代逐步对交通、市政、绿化、经济、管理、城市史、社会学等方面进行融合形成专业教育体系整合；进入 21 世纪，学院适时提出了“生态城市、绿色建筑、数字设计、遗产保护”四个新的发展方向，计算机辅助设计，虚拟仿真、GIS 等相关技术的加入以及城市遗产保护工作赋予城市规划教育新的动力。近十年来，对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主动引入开创了“智慧城市规划”的新天地，同时社会人文学科的深度介入、城市防灾和灾后重建、乡村建设等新的学术挑战也推动着城乡规划教育不断前进。

第二，教学结合实践。

非常值得庆幸和自豪的是，我们的城乡规划教育从创立之初起，就与实践紧密相连。课程设计实习和毕业设计，往往有“真题真做”的机会；例如早年的工人新村规划，1980 年代的胜利油田总体规划、平遥古城保护规划等积累打

下了坚实的学科基础；在 1990 年代，教学和实践相结合迎来了实践的第一个高峰，获得国家教学成果特等奖。后来的 2010 世博会规划，江南水乡保护规划，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北京副中心城市设计，雄安新区规划等，既是我们规划教育不断更新“任务书”的来源，也是我们检验教学方法和学科理念的机会。

第三，国际国内合作。

我们的城乡规划学科，是一个可以连接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机构、不同专业人群的领域；开放办学是我们的成功经验。1950 年代初创专业，就是向国外领先学校学习的结果；60 多年来与各级政府和学术机构的合作联系始终保持良好，教学实践基地遍布全国。进入新千年以来，国际合作进入快车道，举办了“世界规划院校大会”，进行了 3 次国际评估咨询，建立了数十门全英语课程，十几个双向双学位课程。每年培养约 50 多名中外双学位城乡规划研究生；学院每年开放国际专业讲座达到 150 场左右。近五年来，国际国内合作特别注重三件事：对标世界顶尖大学，进行学科发展布点，在生态城市、智慧城市、公正城市、数字城市等方面加强发展；促进学科交叉，结合上海市“高峰计划”和教育部“双一流建设计划”，建立国际国内学科交叉团队；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创造了大量的国际合作交流机会，例如“未来城市与建筑国际博士生院”等。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专业教育总是在不断前进和发展。而中国的城乡规划教育，就在过去的十年里，发生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首先，我们城乡规划的工作对象，发生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变化。

在城镇化高速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们的城市规划任务忽然就进入了一个“存量时代”，与城市更新、城市设计、城市遗产保护相关的工作陡然增加，规划规模宏大的新区园区的机会在逐步减少；众多的城市和区域面临着“调规”的工作。中央政府领导城市规划工作的部门，从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划入了自然资源部，是否象征了城乡规划工作从“建设”的意味变为“资源调配”的性质了呢？这很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其次，我们专业工作的理念，从“软硬适中”向着“软硬结合”变化。

在以往的城市规划教育中，我们强调的是硬件的建设；软的人文、社科、

管理等部分内容是帮助我们分析推导的工具，是经验公式般的支持手段。而规划成果最后的呈现方式，是在硬和软之间，找到一个简易快速的平衡点。而今天，城乡规划似乎在向着“软的要更软，硬的要更硬”的方向发展。例如，我们的规划目标中，“软”的运营、管治、文化遗产保护、公众参与，也成为城市规划的主要内容；在城市规划研究中，加强了对人的研究，从职、住、行，到家庭、社群、产业、社会公正，研究的外延在发展。而“硬”的部分更甚。比如，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共同管廊，体现了硬件里的“硬技术”提高；设计研究中人工智能、高精度地理信息系统、虚拟现实等新技术为城乡规划带来了更新的“硬方法”；对城市海量数据的掌握和例如 CIM 等系统的精准运用成为成长中“硬资源”。

就是在这样的变化中，我们过去十年中专业教学在发生新的改变。

这里呈现给大家的，是 2007—2017 年 10 年间同济大学城乡规划专业教师在各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的教育研究论文，共 33 篇结集出版，分为教育思想、教学方法和国际化教育三章。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回望过去，立足当下，展望未来。

按照规划系的安排，每位老师至多只可入选一篇，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同济规划教育学术民主的气氛，这也是我们至为之珍惜的精神所在。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院长

2018 年 10 月 6 日

序二

唐子来

2011年，中国城镇化水平超过50%，同年城乡规划学成为一级学科，这也许不只是历史的巧合。中国的城镇化正面临着机遇和挑战的并存，走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道路既是中国社会的广泛共识，也是国际社会的殷切期待。

近年来，可持续的城镇化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于城镇化和城乡规划的如此高度重视是史无前例的。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召开，2014年3月发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2015年12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2016年2月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如今，中国发展已经进入新时代，由高速度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中国的城乡规划学科任重而道远，如何为新时代的中国城镇化道路提供适合国情的思想、理论、方法、技术，并且培养高质量的城乡规划专业人才，始终是城乡规划学科发展的核心使命。

同济规划教育论丛收录了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教师在2007—2017年期间发表的33篇教研论文，既体现了对于教育思想和方法的一贯重视，也展示了国际化教育的最新趋势，期待本论文集将会成为城乡规划教育工作者的有益读物。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城乡规划学科专业委员会主任
城市规划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8年10月4日

序一 // 李振宇

序二 // 唐子来

1 教育思想

“人居三”对城市规划学科的未来发展指向 // 吴志强	3
新世纪以来同济大学城乡规划学科的发展历程 // 唐子来	18
“城乡规划学”基本概念辨析及学科建设的思考 // 杨贵庆	26
论城乡规划学学科生命力 // 沈清基	42
中国城乡规划学科发展的历史与展望 // 孙施文	65
中国城市规划专业教育的回溯与思考 // 侯 丽 赵 民	81
从乡村规划教学视角思考城乡规划教育的变革 // 张尚武	105
认知·发现·探索：城市规划教育中的人文关怀——关于 城市规划专业教学中的价值观培养 // 赵 蔚	114

2 教学方法

多学科协同的城市可持续发展通识课程教学探索——以同济 大学“可持续智能城镇化”通识课为例 // 吴志强 干 靓	123
大学通识教育中植入城乡规划课程的教学探索——同济 大学通识课程“城乡发展与规划概论”实践 // 彭震伟 张 立	135
阅读城市：一门城市规划入门方法课程的探讨 // 王 兰 刘 刚	144
刍议城乡规划专业综合设计能力培养所面临的问题——从住宅区 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到规划管理 // 杨 帆	154
范式转型：一种基于理念演绎为导向的规划设计 教学新视角 // 李 晴	165

村庄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的联动教学 // 耿慧志	179
同济大学乡村规划的教学课程组织探索 // 栾 峰	188
乡村规划及其教学实践初探 // 张 立 赵 民	197
艺术村落——以问题分析为导向的宋庄城市	
空间设计 // 童 明 包小枫	205
授人以渔——以方法论为导向、注重知识综合运用的毕业设计	
教学实践 // 田宝江	219
城市规划专业教学体系中遗产保护课程建设探讨——以同济大学的	
教学实践为例 // 张 松	233
“竞赛嵌入式”教学方法改革初探——以城市交通课程为例 // 刘 冰 ...	244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本科教学中的工程规划教学——历史、现状	
和未来 // 高晓昱	255
复杂与规范：城乡规划专业城市地理学现场教学	
实践 // 陆希刚 王 德 朱 玮	267
三个层次的要求、三个层次的课程——对城市规划专业 GIS 课程	
的思考和建议 // 钮心毅	277
“c + A + d”——城市规划计算机辅助设计课程教学	
的探索 // 庞 磊 杨贵庆	287
发挥学生创造力的平台——城市系统分析之多代理人	
模拟教学探索 // 朱 玮	296
以实践为导向的地理信息系统“逆向”教学模式 // 宋小冬 钮心毅 ...	312
交通仿真模拟在居住小区规划设计教学中	
的运用 // 汤宇卿 曹 凯 管含硕	322
城市规划快速设计能力的培养与考查 // 于一凡 周 俭	337

3 国际化教学

城市规划高等教育是否应该更加专业化——法国城市规划教育体系	
及相关争论 // 卓 健	349

建筑与城乡遗产保护教学改革初探——以中法同济-夏约联合教学

成果为例 // 邵 甬 周 俭	360
MIT OCW 与我国城市规划学科教育的比较与借鉴 // 王 骏 张 照	378
以空间训练为核心——法国凡尔赛国立高等建筑学院城市设计教学	
经验 // 杨 辰 卓 健	389
“新常态”下的城乡规划教育与 UCL 的启示 // 黄 怡	403
后记 // 杨贵庆	417

1 教育思想



吴志强：

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副校长、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导，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建筑师学会荣誉会员（Hon. FAIA），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上海市科技精英，上海世博园区总规划师。兼任全球规划教育联合会联席主席、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建筑教育委员会终身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城乡规划学学科评议组第一召集人、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副会长、中国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

“人居三”对城市规划学科的未来发展指向

吴志强

假如说,1976年的温哥华第一次世界人居大会(以下简称“人居一”)是城市规划学科在联合国政治舞台上从学术被抬升为城市公共管理的一次盛典(吴志强,2005)。那么,1996年在伊斯坦布尔第二届世界人居大会(以下简称“人居二”)上,城市规则被绑定为政府过度干预忽视市民主体的殉葬品。而2016年基多第三届世界人居大会(以下简称“人居三”),则唤起了世界对城市规划学科重要性的重新认识。

有幸参加“人居三”会议第9政策小组参与起草《新城市议程》工作,并以此为契机促使自己细读人居大会的历史文献,我冷静思考着城市规划学科在世界城市治理中的定位:城市规划作为一门学科,什么是过度的公共产品定位?什么是作为学科力所不能及?什么才是学科的本质内核?什么是学科的力量?什么可以是学科的公共政策外溢?

“人居三”的重要性在于,它再一次重新确立了城市在世界人居环境中核心地位^①。“人居三”的重要性也在于,既重新给予了城市规划在城市治理中的高度关注,也强调了城市规划作为学科在城市发展决策中独特而独立的学科支撑作用^②。对城市规划学科来说,避免城市规划学科就是城市公共政策,甚至简单地等同于城市政府自上而下的管制工具,如同在“人居一”会议上所主导的观点(联合国人居署,1976),是一门学科在热潮和冷遇之后的成熟。

1 《新城市议程》的创新点

《新城市议程(New Urban Agenda)》是“人居三”会议的核心文件,与前

两次人居大会相比，它具有以下 5 个创新点。

1.1 “进城权”的提出

这次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在城市里居住，是人人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英文原文中用“Right to the City（人居署，2016）^③”，我把它译成“进城权”。有人把它翻译成“城市权”是错误的，“城市权”是 Right of the City，是指城市作为一个行政空间单元在国家和区域城市群中所应享受的独立自治权。而《新城市议程》所强调的是指个体的人，在全球性的城镇化过程中不应受到种族、收入、教育、信仰等社会群落背景的歧视，公平地参与全球各国各地的城镇化历史性进程。

将参与城镇化、进入城市的权利上升到天赋人权的高度，是空前的，也是历史性的。这可能对于我们所有城市学者、城镇化研究都是陌生的，这完全有可能在国际城市学界和国际政治上，成为站在城镇化和城市发展价值观最顶端的一条全球性的规则。作为联合国主办的人居大会所提出的官方价值，这相对于前两届人居世界大会所提出的关键概念（人居署，2014），在国际城市学界、人类学研究和现代化研究方面，都是一次历史性的提升，相信会产生全球性的广泛且长远的价值体系建构影响。

1.2 “知行合一”的推进

过去两届的人居世界大会每次都产生两份大会文件：宏观的宣言（Declaration），以及依据宣言精神制定的行动计划（Action Plan）^④。此次“人居三”会议首次将两大文件合二为一，宣言条目后则必有明确行动指南，两文合一。

在文件制定过程中，每每讨论到宣言的主题思想，定会附有政策建议与措施（人居署，2016）。强调的是说到做到，知行合一，这是人居大会思想方法上一次重要的历史性提升，这有可能会影响改变各国城市发展政策文件的起草模式和思想方式。

1.3 城市主题的突出

前面两届人居世界大会所形成的历史文件，并没有把城市如此突出到像“人居三”一样的核心高度（人居署，1996）。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全球半数以上的人类已经进入了城市居住，全球的城镇化进入到了新的历史性阶段（人居署，2014）。

会议中人类的居住问题从多个层面和不同视角聚焦到了：城市从对地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对人类的基本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对人类经济生产的主要活动，以及对市民社会产生的各个方面影响。城市已经占据了人居议题的中心位置（人居署，2016）。可以预见人居署未来的重点会继续聚焦各国的城市问题。

1.4 多级政府的互动

第一届人居世界大会强调的是国家在人居环境上的作用。作为联合国的文件，强调的是各国政府对于人居环境的基本共识，是联合国框架下的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作^⑤。“人居二”与“人居一”反其道而行之，强调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对于人居环境改善的作用，出现了对强调国家政府作用的历史性反思。而“人居三”会议的主题思想强调的是多层政府之间的纵向合作和横向协同（人居署，2010；人居署，2014）。

强调各级政府，从国家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合作，包括联合国层面；从国家政府、地方政府，到乡镇自治政府在各个层面上的不同作用与责任。与前两次人居世界大会所强调的人类居住所面临问题不同，城市问题成为各国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关注人居的中心问题，也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国家间移民和跨区域城镇化移民都集聚城市的趋势，国家政府之间、各级各地城市政府之间协同合作成为重要内容。

1.5 规划地位的重塑

从1976年的“人居一”到1996年的“人居二”，再到2016年的“人居三”

的历史文脉中,可以读到城市规划作用认识的40年变迁。“人居一”会议上,城市规划在20世纪70年代被历史性地提升到国家政府管理人居环境不可缺失的公共政策。“人居一”宣言在强调各国政府对人居环境问题的认识,积极改善各国人居环境质量要求的同时,将规划视为国家政府的公共政策^⑥。在规划的作用被联合国文件提出的时候,城市规划也被绑架成为了政府政策。事实证明,城市规划被如此定位,是其对城镇化、对城市发展规律和城市土地空间分布规律,以及对规划自身编制规律的科学内核的忽视,如此以往,对于一门缺乏内核知识体系系统架构的年轻学科,有时甚至是有害的。20年后的1996年“人居二”会议,只强调国家政府责任和作用的“人居一”主题思想,被大量参会的非政府组织全盘质疑(人居署,2005;人居署,2007)。城市规划在“人居二”会议上被视作各国国家政府的政策,也与自上而下的模式一起受到质疑和批评。

实际上,现代城市规划一直保持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综合模式。公共政策在城市规划中,只是与自下而上的民众参与、贯穿始终的专业知识一起共同发力的各方力量中的一个向位。“人居三”文件在“人居二”的基础上大幅提升了城市规划作用的篇幅和地位,更重要的还是,更加综合地看待城市规划对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多方面作用,强调了其系统性协同上下的作用,强调的是其对城市战略和公共政策的学科支撑作用。可以清晰认识到城市规划学科回归到在人居中的重要地位和对城市规划的创新要求。《新城市议程》的通过,对城市规划学科未来20年的走向,对城市规划自身的反省,对规划学科的内生性动力的激发,都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因而,“人居三”基于以上五个创新点,提出了五个关键要求:

- 1) 要求关注人人参与城镇化的权利;
- 2) 要求政策行动与宣言思想合二为一;
- 3) 要求更加聚焦关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 4) 要求多级政府之间上下协同广泛合作;
- 5) 要求重视城市规划重要的综合支撑作用。

2 人居大会对城市规划影响演变

2.1 “人居一”对城镇化认识的局限

“人居一”于1976年在温哥华召开。1976年世界平均城镇化率达到了37%。彼时的中国还处于“文化大革命”末期和“改革开放”的前夜，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和规模全面展开，偏离了当时发达国家认知的城市化发展规律（人居署，2005）。对比发达国家的百年城镇化历史，当时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城市扩张现象几乎遭到了所有城市研究和文献的批判（人居署，2001）。发达国家中主导城市规划思想的团体指出从没见过这样的城镇化，从没见过这样快速的人口增长，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速度是失控的，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的环境污染与恶化成为全球的心理压力（吴志强，2015）。在两极分化的世界，也就是当时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城镇化风起云涌，而在西方基本完成了城市化后的视角看来，这是彻底的失控。这就是“人居一”的时代背景，也体现在它的主题“失控的城镇化（Uncontrolled Urbanization）”中。另一些关键词：“拥挤”、“污染”、“恶化”则反映出大都市地区的发展压力，“人居一”也关注了快速城镇化带来的不平等，如城市移民、城市用水、卫生环境、无家可归等指向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失序（人居署，2007；人居署，2011），且是日益失序的大量问题，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呈现的人类史无前例的城镇化的惊讶。

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人居一”制定了两份重要文件，一是《温哥华人居宣言》，另一是行动计划。《宣言》提出了16个关注点、3个机遇、19条总原则和11条行动指南。根据《宣言》的精神起草了65条行动措施，包括居住区的政策、住区规划。规划的作用被提上议程，认为治理城市的失控需要规划，还包括对庇护场所、社会设施、土地的规划，并加强公众参与和机构管理^⑦。“人居一”的直接贡献是促生了联合国人居署的前身，人类住区委员会（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Human Settlements）在大会的第2年成立（人居署，2004）。

“人居一”的两个文件是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成果，然而大会的局限性也是